

浙江大学的校史里，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军西征”是最出彩的一章，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那段经历都称之为“逃难”。我年少时经常听家人讲起逃难时的点点滴滴，看到而且用过一些抗战和逃难遗留物品，印象极深：一条墨绿色的羊毛军毯，非常结实，三哥临安到了九十年代还在使用；一只厚实的小铝锅，质量比我五六十年代添置的同类产品好得多；一只洋铁皮饼干罐，外面的彩色图案依稀可辨。这三件物品都是所谓的“美军剩余物资”，如果照我大哥宜山的说法，是国民政府胜利后在大后方遵义分配给浙大家属的，那么我家回迁杭州的时候，它们还曾经打入行李，与主人一起由黔入湘，经长沙北上汉口，走长江回江南，简直不可思议！二哥渭江提醒我，这些用品也可能是父亲1946年回到杭州以后买的地摊货，“美军剩余物资”流到市面上的途径多且杂，一个个中间环节都能生利发财，政府根本无力统一分配。这么一点小事，面目还如此模糊，那么下面的记述，更需要浙大后人修正、指谬。

我家建德村二楼的樟木箱下面，有个大木箱，是由一些粗劣的木板拼凑着钉起来的，外面还有未揭干净的纸条和毛笔写的数字。母亲说，那是浙大1946年“光复”回迁路上用的装运箱，到了杭州后待处理，母亲废物利用，拿回大学路临时住处放衣物。1948年我家搬入新建的宿舍区建德村，箱子跟着乔迁，一用就是半个多世纪。二十年前建德村拆迁，那只木箱就扔掉了，其实它装着浙大的仪器设备，可以在校史馆里展出的“西征”文物。当时祖父留下来的好几只楠木书箱都不要了，怎么会留下这么一只简易的木板箱呢？家里另有一件纪念品，那是一面横着的三角锦旗，上面绣有“东亚健儿”四个大字。我二哥渭江生于1942年10月，他的名字即流经贵州湄潭、注入乌江的那条河流。1943年，浙大与湄潭县政府联合组织了一次婴儿健康比赛，渭江获奖。评选期间当地土绅不想输给“东亚健儿”，浙大评委迁就地主，将最高等级的荣誉颁给湄潭的孩子。可惜的是这面屈居第二的锦旗下落不明，恐怕也当“旧货”被人收走了。据说渭江一两岁的时候壮鼓鼓的，长两只大眼睛，嘴馋，会走路了就有意在永兴场（现永兴镇，简称永兴）的浙大一年级食堂逛来逛去，个别家境好的学生有时为了逗他，给他肉吃，甚至会赏只肉包子。近日网上购得苏步青题签、缪钺作序的《钱宝琮诗词》（浙大校友总会1992年编），大多为逃难期间作品，再现了浙大西迁细节。集中收有《湄潭女学生梁仙翠言“校中膳食艰难，啖白饭有味”感赋》（作于1945年），从诗题可见当年吃肉包子很难得。钱宝琮是浙大“湄潭吟社”主要成员之一，中国数学史权威，向以待人厚道闻名学界，1956年从浙大调中国科学院任一级研究员。

祖父是浙大会计，生于杭州，随校西迁意味着远离龙驹坞祖墓，未必十分情愿。父亲独子，他和母亲结婚的日期应该是在1937年8月14日“宽桥空战”之后，第二次淞沪会战结束之前。上海战事无望，杭州人心惶惶，新婚的父母曾到龙驹坞坟亲冯其昌家避居。七十年代我去上坟，坟亲夫妇还指给我看父母逃难前临时住过的木屋。那年11月下旬，祖父率一家四口随浙大迁至“文军西征”的第一站建德，那是浙大“弦歌不辍”的起点。日军步步紧逼，建德也遭到空袭。钱宝琮的《建德行》（作于1937年）中有此四句：“昨日警铃响，敌机袭近郭。市民惶极甚，奔窜各喧呼。”

祖父是浙大会计，生于杭州，随校西迁意味着远离龙驹坞祖墓，未必十分情愿。父亲独子，他和母亲结婚的日期应该是在1937年8月14日“宽桥空战”之后，第二次淞沪会战结束之前。上海战事无望，杭州人心惶惶，新婚的父母曾到龙驹坞坟亲冯其昌家避居。七十年代我去上坟，坟亲夫妇还指给我看父母逃难前临时住过的木屋。那年11月下旬，祖父率一家四口随浙大迁至“文军西征”的第一站建德，那是浙大“弦歌不辍”的起点。日军步步紧逼，建德也遭到空袭。钱宝琮的《建德行》（作于1937年）中有此四句：“昨日警铃响，敌机袭近郭。市民惶极甚，奔窜各喧呼。”

杭州12月24日沦陷，浙大当日开



# 笔会

归途  
(国画)  
姜怡琦

# 逃难

陆建德

永兴，一年级学生多，祖父所属的总务处也在永兴办公，父子两家同住。我家在永兴的住处保存完好，那是一栋L形二层砖木结构楼房，楼主姓张，浙大以高于市价的租金租了下来，安排十几户人家入住，现在以“浙大教授楼”的名义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祖父和父亲都不是教授，分房过程中两人资历相加，得分较高，才能与教授们比邻而居。二哥和三哥临安（以杭州古称寓意和平在即）分别于1941年10月、1944年8月出生在那栋房子的楼上，自然的生命步伐在非正常时期依然欢快地稳步向前。十年前，我乘社科院外文所去遵义参观的机会，独自离队跳上长途汽车去湄潭，转车到永兴寻找我家旧居，当时那栋房子里还住着居民。近日看到“浙大教授楼”的照片（2018年7月拍摄），原住户完全清出，反而少了生气。

抗战期间，国立大学发放工资基本正常，但是通货膨胀率高，我家收入恐怕不敷销支。浙大还为年资较长的员工发放过补助，比如竺可桢1943年12月11日记载：“今日确定长年在浙大工作职员奖励金名单，三十年以上者为陆绩勋、叶筠二人……”我印象中那栋楼房前后有小块菜地，母亲当年很可能种过菜，不然五十年代她在建德村东边“城墙”（城砖一无所存，实为小土山）上种植南瓜、冬瓜等蔬菜，怎么像是开荒老手呢？1972年或1973年，中科院物理化学家、浙大校友吴征铠儿子（名字是不是天灏？）携夫人从北京到杭州度蜜月，住我家。他说建德村不少住户都曾分享过母亲在“城墙”上的劳动所得。“城墙”在1957年至1958年夷平建环城东路。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把花园辟为菜园（各种菜苗得自立春门菜农“保生哥”），我家蔬菜供应非常充足。

浙大教职员逃难时利用边角角的闲地种植蔬菜，也是自力更生。钱宝琮1940年作《吃饭难》，开头四句道出各家各户的艰难：“黔南物产丰，生计慎挥霍。迩来困征输，物价亢腾跃。”苏步青在湄潭住朝贺寺，听祖父说，他孩子多，偶尔要到校财务室借钱。但是他也争气，与日本夫人垦殖自借，有诗为证：“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苏步青《五律·夏日遣怀》）王淦昌夫人在湄潭的家庭副业也是牧羊。

母亲会吃苦，外公生前是想不到的。外公叫莫善诚，字存之，1930年死于肺病，年仅四十二岁。逃难时浙大的老人应该知道他。他是十四岁的前清秀才，曾在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文法政科就读，与陈布雷是同窗好友。国民党北伐胜利后，陈布雷曾请外公去南京担任公职，外公以身体原因为婉拒，这是实话。1910年浙江督抚增福筹备许炳堃（号毓甫，1878-1965）筹备学党发展地方工业，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当年成立，第二年春节后正式开学。1918年寒假期间浙江教育会派代表赴日本考察，会长经亨率团，外公为成员之一，时任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监兼教员。1919年11月，该校新旧同人会在蒲场巷报国寺的工校礼堂（在浙大迁玉泉前的城东旧址）成立报国工业会，事务所暂设校内，许炳堃是会长，外公与许炳堃同为德清人，是该会发起人之一，担任过副会长。外公信奉实业救国，思想开明，给小女儿取名嘉新，有改变旧法之意，但是他在生活上还是受制于旧习，为传宗接代纳过妾，果然添了一个儿子。外公辞世不久，母亲最爱的小弟弟突然死了，他的生母不知被打发到什么地方。弟弟的悲剧，母亲压在心里，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两年，才把自己儿时的创伤一点点吐露出来。母亲在杭州读了仅设初中的行素女中，毕业不久就嫁人。外婆处事果决，说到她，母亲的感情非常纠结。我存有的那张外公照片一定是在整个逃难期间与母亲须臾不分离的。母亲每想起外公，就抑制不住伤感，1964年还违背时俗在家里祭过一次祖。祖父是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创建时的成员，也曾加入报国工业会并在会刊上发表文章，应该与外公相熟，但是外公所藏光绪二十八年《春在堂全书》怎么会出现在祖父书箱中，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

母亲曾说，她在1939年春生大哥之前还怀过一个男孩，逃难路上流产了。推算起来，这个不幸事件大概发生在江西泰和。逃难对母亲来说是特别难的，新婚燕尔就要离乡漂泊，她舍不得把自己的嫁妆留在杭州，居然拖着她的八只皮箱（六大二小）走上内迁之路，浙大校方对她、对我家是极其宽容了。

多了一只藤条箱，母亲省了很多心。我家终于轮到上车。那是一辆美国军车，盖有军篷，后面敞开，由一位中国军人驾驶。车上载运了三四户浙大家属和各种行李，孤零零地启动出发。没有车队的前后照顾，司机万一有事要与校方联系，只能呼天叫地了。大哥十分有把握地说，汽车先是沿着乌江行驶，公路险峻，转了不多不少七十二个弯。我祖母那时信佛，嘴里不断轻轻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沿乌江的路最难走，盘山公路的下面，时见翻滚到江边的汽车，既然事故多发，驾驶员应该尤其小心，但是路上的汽车却有前赴后继之勇。有一辆车要超车，司机小心避让，让它先走，大哥后来发现那辆“一骑绝尘”的车斜落在路边，两只后轮悬空，还好没有滚落谷底。

军车开到贵州最东端的玉屏，差不多整整一个白天。玉屏的箫和笛全国闻名，满街都是。过了一夜，浙大家属继续东进，在永州一带进入湖南，直抵长沙。二哥出遵义就晕车，一路可以说受尽折磨。到了长沙，汽车过湘江上了渡轮，父亲带他下车到渡轮上，让他透透风，很可能他还吐了。从此他落下容易晕车的毛病。我家接着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三个哥哥以前还没有坐过火车，肯定大声喧闹个不停。当时武汉汇集了大量过客，都要从内地回江浙一带，船票非常紧张，不易买到。浙大不能负担广大师生在武汉的住宿，让大家“投亲靠友”。我家就麻烦祖父在武汉的朋友，住了约莫一周。这段时期浙大指挥回迁的人士工作量极大，员工散居各地，必须保持有效联络，在电话稀少的年代做到这点，真是不容易。我家在武汉搭乘的是一只长江上的小火轮，老少七人被安排在统舱，近船尾的火炉，极热。这只轮船一路停停靠靠，顾不得江南乘客的归心，悠悠地顺流而下，近二十天才到上海。大哥记得江边停泊着一艘美国军舰，火轮无法靠岸，于是所有乘客坐小舢板登外滩。父亲离开昔日读书的地方，已整整十年。大哥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有轨电车，它们发出悦耳的铃声，一定是把我三个来自乡下的哥哥惊呆了。

我家在上海逗留数日，再坐沪杭线回到杭州，父母住庆春街老浙大近旁的第一宿舍，祖父母带了长孙回旧居。这是1946年夏。同年9月，浙大逃难期间分散在遵义、湄潭、永兴和浙江龙泉四地的全校师生员工，终于在西迁一年后重新聚会于杭州。1947年1月，姐姐庆春（大名成均，取自马一浮作词的新大校歌）出生于第一宿舍，竺可桢的姘头陈淑送母亲一只母鸡表示慰问。建德村的房子建好，浙大再次制订计分规则，我家又因祖父和父亲合计分数，搬进位置最佳的甲种12号，那是在1948年。现在想想，真有点惭愧，我家是否利用规则占了便宜？当时建德村甲种前后两排仅12套住房，邻居中有钱宝琮、王淦昌、贝时璋和王葆仁等顶级教授（他们去中国科学院后都是一级研究员），而我祖父无非会计，父亲职称不过讲师，1956年才评上副教授。我的三个哥哥从小是散养的，体质好，打起来的架子团结对外，气场很足，从未有过哪怕是微弱的自卑感。换个角度看，当时的浙大平等观念强，孩子中间从不以长辈级别排座次，完全不像五六十年代的杭州西湖小学。

逃难途中，作者父母在广西宜山下第一个孩子。



作者祖父，为浙大服务三十年，佩戴三角形浙大校徽。



逃难途中，作者父母在广西宜山下第一个孩子。



1952年一家人在杭州的合影，三个儿子都在抗战中出生、长大，女儿为1947年回杭后出生。作者尚未出生。

《赞陆绩何先生》：工校始建立，即今卅年久。象数格物基，初学赖善诱。叹息光景驰，俄焉两生肘。强君领簿书，要会冀不苟。……惟看松柏姿，苍颜尚抖擞。相识一星经，友我直谅友。元夜灯红里，举觞献寿酒。光荣祝浙大，健康颂陆史。

祖父曾在安定中学和甲种工业学校教过数学，复行是他学生。“象数格物基，初学赖善诱”两句讲的是他这段经历。那一年年初（“元夜灯红里”）祖父就开始撰他“卅年”的谱，制造气氛，让我莞尔。钱宝琮待人谦厚，他自己才真正是谆谆善诱的，陈省身、江泽涵等数学家都是他弟子。

祖父生于光绪庚寅年三月十八日（阳历1890年5月6日），他大概是过阴历生日的。此前一年的1939年春，大哥出生后一个多月，祖父迎来五十大寿（虚龄），友朋写诗填词为他祝寿。昆虫学家、浙大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之子蔡恒生先生今年年初从加拿大用微信发我姐姐他母亲写的《贺陆绩何先生得孙并祝五十寿》一诗：

云间凤鸟旧儒风，磊落襟怀自不同。慷慨悲歌怀壮士，慈仁惠泽遍孤穷。望衡早已钦佳气，积德常能感上穹。正祝功兼兼献寿，一家双庆乐方隆。祖父收入不高，但是他“慈仁惠泽遍孤穷”的事迹我也知道不少。“云间凤鸟旧儒风，磊落襟怀自不同。”如果我以为这两句诗并非过誉，是不是为亲情所昧？祖父五十年代初退休后保留了多年在会计室养成的习惯，总备有一本笔记簿记每日的开支，本子封面上书有“量入为出”四字。他一生没有积蓄，1972年年初去世时上衣口袋里更有现金二十三元，那是他的全部存款。祖父甚至帮助过要人。1949年头几个月，民主党派人士孙晓村在祖父家避风。他夫人吴元成是祖父女儿，其弟吴京是父亲浙大机械系同事。祖父的六十大寿是在家做的，孙晓村请客，我家倾巢出动。过了一个多月，杭州就解放了。

五十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很多浙大教师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浙大教职员住房分配的压力略有缓解，祖父母搬进建德村，住丙种804号。这套一厅一房的房子位于建德村的最东端，带个可爱的小院子，后来因建环城东路拆除，祖父母住到甲种一号楼上，直至1966年。

建德村里能分享逃难经历的邻居越来越少。今年夏天，一些现在已七八十岁的浙大子女结伴重走抗战的“文军西征”之路，我比他们小不少，未能同行，不过也借此机会把我知道的我家逃难琐事记下。

写毕于8月15日

更多图文请见“文汇”App和“文汇笔会”微信公号。

——编者



「文汇报笔会」  
微信二维码

归途  
(国画)  
姜怡琦